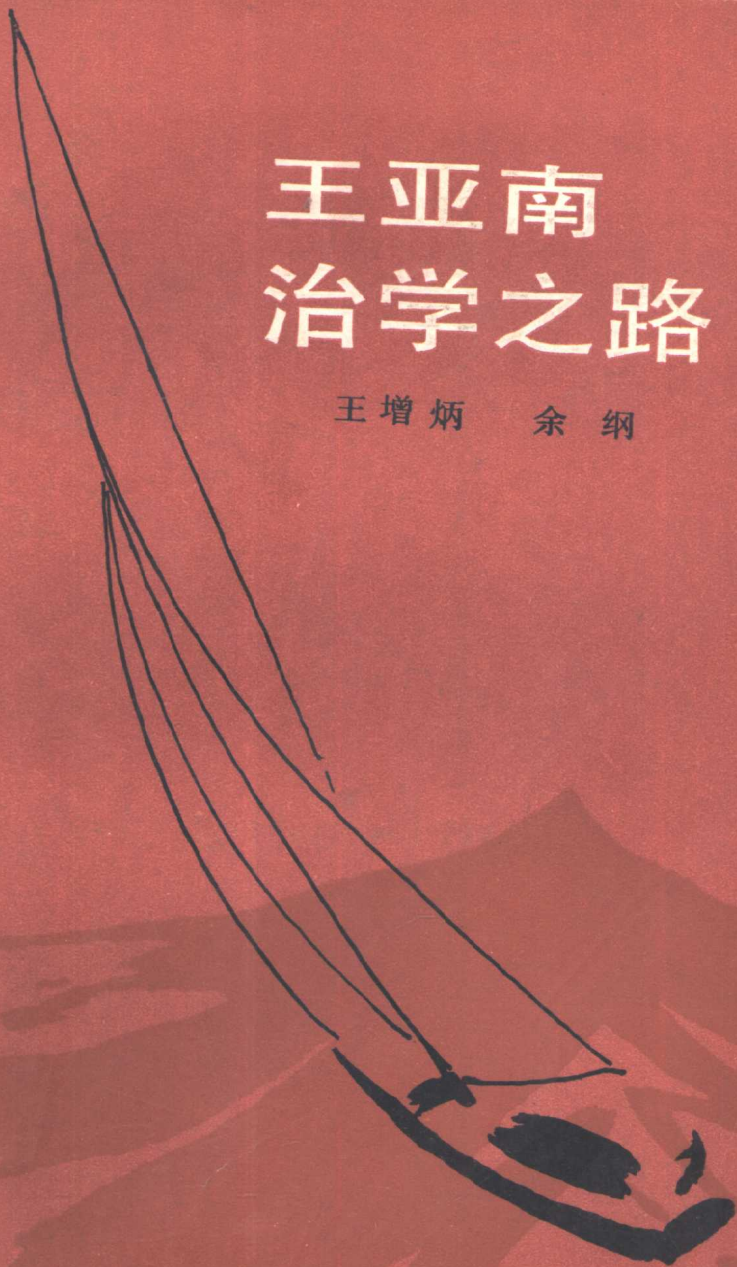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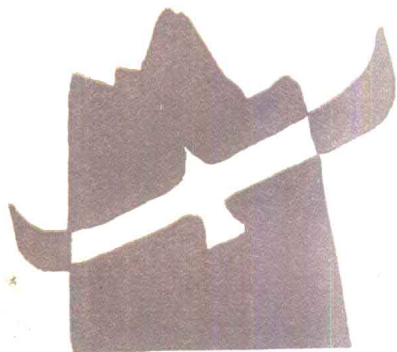


王亚南 治学之路

王增炳 余纲





王亚南治学之路

王增炳 余 纲

福建人民出版社

王亚南治学之路

王增炳 余 纲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4印张 4插页 79千字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40

书号：7173-628 定价：0.50元



王亚南在厦门大学

知识分子的改造，与湖上划船
 划艇赛，是和安民生活打成一
 片，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过程。但服
 安民之服，衣安民之衣，像安民
 一样劳动，未必就一定体会到安
 民。问题在于需要在劳动实践
 中，提高自己的认识，确立自己
 的人生观，改正自己的思想方法。
 这是每一位划艇赛的同志应当
 注意的。 王亚南

王亚南

王亚南

1958.1.12

王亚南给王增炳的题辞

余綱曰
王亞南
1951
11.17

苟工你工要拒絕
幫人工要收細故

王亚南给余纲的题辞

目 录

序 章 战士与“老农”	(1)
第一章 莫立根基 坚定不移	(8)
(一) 为学须及早	(8)
(二) 博与专	(13)
(三) “书山有路勤为径”	(18)
第二章 探求真理 实事求是	(23)
(一) 鞭辟入里	(23)
(二) “方法论很要紧”	(28)
(三) 再认识	(33)
第三章 学用结合 言行一致	(38)
(一) “以中国人的资格”	(38)
(二) 理论与实际	(44)
(三) 身体力行	(49)
第四章 多思巧干 坚持不懈	(55)
(一) 走自己的路	(55)
(二) “好整以暇”	(62)
(三) 尽毕生之力	(64)
第五章 切磋论难 教学相长	(67)

(一) “共学”	(67)
(二) 教学相长	(72)
(三) 辛勤育桃李	(74)
尾 章 可贵的启示	(82)
附 录 王亚南著译系年目录	(87)

序章 战士与“老农”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庄严的号召：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奋斗。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要把中国这样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造性工程之一。这个事业的许多课题，是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和解决的。”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仍然是学习。

学习是一种艰巨、复杂的创造性劳动。要搞好学习，必须掌握学习规律，讲究学习效果，这就要求我们不但要善于积累、总结自己的学习经验，而且要善于学习他人包括前人的学习经验，以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促进我们的各项工作。

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想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下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解放后第一任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治学的道路。因为他不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关心、培育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科学的园地上辛勤耕耘几十年，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宝贵

的治学经验。目前，广大青年正在努力学习，渴望成为四化建设的有用人才。认真总结王亚南的治学经验，介绍他的治学道路，对于促进青年的学习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就更多的优秀人才，将会有所裨益。因此，我们抱着纪念与学习的心情，编写了这本小册子，以期有助于求学者。

王亚南是怎样治学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让我们简要地介绍一下他的生平。

王亚南，字渔邨，又名直淮。一九〇一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农村。

王亚南幼年在家读私塾，《论语》、《左传》、《国语》、《离骚》、《史记》等都一一熟读。十岁时父亲病逝，家中生活日益困苦，靠大哥和已出嫁的姐姐资助，才在武昌第一中学读完中学。一九二三年考入武汉中华大学教育系。为了生活，他每天来回跑几十里路，到近郊的楚材中学兼任英语课，后来又回到武昌成城中学兼任英语教员。白天听课、教课，晚上复习、备课，每天起早摸黑，读书、抄书，广泛涉猎。他兴趣很广，先后以中文系、英语系为辅系，古今中外，文史哲教，海阔天空，无不涉及。当时他有机会听到兼任武汉中小学教员党政训练处负责人董必武同志的讲话，接受进步影响。一九二七年大学毕业后，他找不着工作，严酷的现实和爱国的情，使他毅然只身奔赴长沙参加北伐军，在北伐军中任政治教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到上海，

因生活所迫流寓杭州，借住于大佛寺内。在这里，结识了一位后来也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郭大力。他们决定共同研究经济学，并拟订了一个合译经济学名著、包括马克思巨著《资本论》的宏伟计划。一九二九年由友人资助，东渡日本，在东京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事写作并按计划开始翻译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名著。“九一八”事变后，他满怀反蒋抗日、拯救祖国的义愤回国，在上海继续从事写作与翻译，同时参加了党领导下的进步文化运动，并兼任暨南大学经济学教职。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福建反蒋人民政府成立，他立即赶往福州参加，并出任《人民日报》社社长。不久，“闽变”失败，王亚南遭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乃取道香港赴欧。在德国、英国住了一年多，深入考察资本主义制度，广搜博采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的革命事迹，继续研究经济学，同时从事写作及翻译。一九三七年冬经日本回国，在上海与郭大力重新会晤后，全力投入《资本论》的翻译工作。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王亚南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八年上海沦陷后，他到武汉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同其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经常来往。他有幸接受周恩来同志的指导和帮助，并有机会到八路军办事处与董必武同志接触。董老对他从事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工作给予热情的鼓励和高度评价。同年，与郭大力合译的《资本论》三卷中文全译本在党的热情关怀和支持下，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是一个重大的贡献。从

此，他成为我国声望很高的进步经济学家。

一九三九年武汉沦陷后，他流寓重庆。一九四〇年九月，他到广东坪石任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经济系主任，致力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和战时经济问题的研究，创办并主编《经济科学》杂志。一九四三年，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访问王亚南于坪石，谈及中国官僚政治问题，这是他后来代表作之一《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的写作契机。在中山大学，他宣传并讲授马列主义经济理论，鼓励与扶持进步的青年学生，受到广大师生的尊敬，但也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忌恨，终于被迫于一九四四年离开中山大学往福建永安，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创办《社会科学》杂志，并组织研究人员去闽西进行农村经济调查。同年，兼任厦门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讲授中国土地问题等专题，深受厦门大学学生的欢迎。一九四五年秋，进步记者羊枣遭受国民党政府迫害，王亚南为之抗议，愤而离职，应邀往福建长汀任厦门大学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支持学生运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与威胁。一九四九年一月，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由党组织帮助离开厦门往香港，五月初由香港北上到达北京。不久，在清华大学任教，讲授政治经济学大课。一九五〇年六月中旬，政务院任命他为厦门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时，他当选为学部委员、常委。

一九五四年起，他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时担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福建省教育工

会主席、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一九五六年，率我国大学代表团访问印度；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率中国教育专家组赴缅甸工作三个月。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因患恶性肿瘤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终年六十八岁。

王亚南同志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利用大学讲坛和研究论坛不遗余力地传播马列主义，并积极支持进步的学生运动，对革命和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学识渊博，一生著译四十一部，论文三百余篇。

解放前，他除了翻译马克思《资本论》、亚当·斯密《国富论》、里嘉图《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以上均与郭大力合译）、高岛素之《地租思想史》和乃特《欧洲经济史》等名著外，主要著作有：《经济科学论丛》、《中国经济论丛》、《社会科学新论》、《中国经济原论》（解放后增订重版，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政治经济学史大纲》和《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等。这些著作充分体现了他所提出的“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主张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在当时的学术界、教育界、政治界都有一定的影响。《中国经济原论》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被译为日、俄等国文字。它是王亚南应用《资本论》的观点、方法及其体系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国化”所作的第一个成功的尝

335606

试。它不但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上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而且首先阐明了中国封建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范畴和基本规律，以及以这个理论为基础的关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理论，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封建土地关系的残酷剥削，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掠夺兼并全面破坏了社会生产力所造成的严重的民族危机与经济危机。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重大贡献。因为象中国这样幅员广大、历史悠久的封建社会以及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它在经济上的许多特殊问题有了科学的、系统的说明，将大大有助于作为一门科学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在上述经济著作中，他还提出了某些新的原则见解，例如，关于中国官僚资本三个形态的理论；根据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可以缩短而不能超越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经济二重过渡的理论；根据中国封建制的差别，东方奴隶制与古希腊罗马奴隶制的差异，综合了现代经济史学的零星见解，提出了落后生产力会扩大诸社会、诸国家的差异，较进步的生产力会相应缩小特殊性的理论。这些对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充实，都是很有意义的。

解放初期，他主要从事教育工作，为改革与发展高等学校的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为社会主义祖国培育英才，不辞劳苦，殚精竭虑，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一九五八年以后，他全力从事高等学校经济学说史教材的编写和资料选辑、《资本论》译文的全面校订等工作。解放以来，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马克思主义的人口

理论与中国人口问题》、《论当前两种社会制度下的两种不同经济现象和市场问题》、《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资本论〉研究》和《政治经济学论文集》等。其中，一九五四年出版的《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是他四十年代提出的关于中国传统封建地主经济特征的总结和运用，成为他的另一代表作，它开创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个学派，对国内外经济学界、历史学界有重大的影响。

王亚南同志长期从事高等学校的教育领导工作和教学工作，先后在大学执教三十多年，对于现代教育的本质与功能、对于如何办好综合性大学以及如何培养和使用人才、如何搞好教学工作等方面问题，都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教育思想。他的教育思想主要散见于他的经济、哲学著作以及讲演录和日常谈话之中。他的教育观、人才观、教学论三者，各成体系，融为一体，内容丰富，是我国现代教育学的一份宝贵遗产。而他的治学经验，尤为系统、完整，富有特色。他曾就如何搞好学习问题发表过许多精湛的指导性意见，同时以实际行动，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下面，让我们专就王亚南治学的道路，作一概略的介绍。

第一章 奠立根基 坚定不移

(一) 为学须及早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

一生之计，也应该是在生命的春天和早晨吧。

历史上固然也有过起步较晚而终于成才的“大器晚成”者，但，错过了大好的青少年时光，毕竟是令人遗憾的。诚然，从专业选择的角度看，王亚南起步并不早，甚至可以说是走了弯路的。或者正因为如此，从他身上更足以显示青少年时代扎扎实实地打下基本知识的基础之重要性吧。

在最早跟私塾老先生学习的时候，王亚南就认真地背诵先生指定要背的古书，四书五经以及《史记》、《离骚》等等，他都一遍又一遍地读得烂熟。这种朗读与背诵的好习惯，他在成为著名的学者之后还一直保持着。他说：“诵读的好处是能帮助熟记，帮助领会与理解。常言说：‘反复诵读，其义自明’，是有一定道理的。”

他小时候没有钱买书，就经常借书来抄。有一次，他从先生那里借来一本《东周列国志》，读了几页，爱不释手，

竟然下了狠心，花了一两个月时间，硬把整本书给抄了下来。抄书看来似乎是一个笨方法，但当时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尤其是在得不到书的情况下。后来他发现抄书对自己的学习帮助很大，通过亲手抄一遍，就等于仔细、深入地学习了一遍，不但加深了理解，而且大大促进了记忆。以后抄书成了习惯，到大学时代还抄，连《史记》这样大部头的书也抄。甚至后来当他在科学上取得成就，努力著书立说的时候，也还保留着摘抄的习惯。当然，他没有时间，也不必整本整本书地抄录了。但做索引卡、摘要卡，往往亲自动手，不假手于秘书或资料员。他说：“经过动手抄摘的东西，往往印象深，记忆牢，用时很方便，自己对之很爱惜。”

多年的攻读，日积月累，为他在基本知识方面奠定了基础。小时候背诵、抄写的古书，有许多后来年纪大了还能背诵、记忆。这对他以后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都有很大的帮助。他的代表作之一，一九五四年出版的《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一书，就大量引用了《尚书》、《诗经》、《论语》、《孟子》、《左传》、《国语》、《荀子》、《孝经》等许多古籍的材料。如其中的最后一章，仅十多个页码的篇幅，引用古书就达二十五处之多。这些材料，他都熟记胸中，所以能运用自如，似乎是随手拈来，这主要是得力于从小背诵了许多古书。不仅是先秦的经典，他对中国历代的史籍也很熟悉。在解放前出版的专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仅“官僚贵族化与门阀”一章，他广泛引用的历代